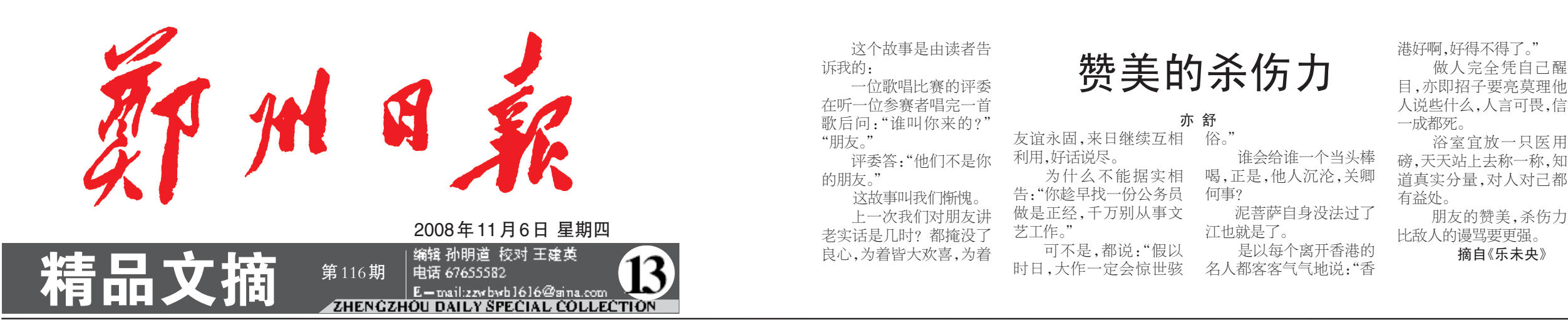




赞美的杀伤力

亦舒。

谁会给谁一个当头棒喝,正是,他人沉沦,关卿何事?

泥菩萨自身没法过了江也就是了。

是以每个离开香港的名人都客客气气地说:“香

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三毛

林青霞

梨酥放在左边边的小茶几上,连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就播放那个年代的歌曲,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历。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因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1990年第2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个奖,也是我22年演艺生涯中唯一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个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20年后的今天,还留在我的心里。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们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她认为我太敏感,很容易察觉到她的心事。通常我和一个人见面,很容易记住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和三毛却不一

样。我被她的气韵所吸引。她那柔软多情的声音,她对情感的纤细和敏感,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向往的爱情,她也喜欢谈论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每次她都能带给我强烈的感受。

金马奖结束后没多久,我还没来得及多谢她,她就走了。现在回想,就在她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件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到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

里重复地念着“干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1991年6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是否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各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飘逸的大红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信息给我,而我却一再的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摘自《月刊》

名流故事

四十五岁的初恋

的。这次拜访充满了情趣。但并未留下特别的痕迹,直到第二年,乌德托夫人才第二次来访,这次拜访才对卢梭构成了强大的冲击。

这一年,乌德托夫人27岁。据《忏悔录》的描述,她说不上美,脸上还有麻子,皮肤又不细腻,眼睛近视,眼型有点太圆。可是她又活泼又温柔,娇小玲珑,亲亲热热,这正是最能打动一个中年男子的气质和风韵。卢梭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在写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朱莉的形象。乌德托夫人热情地谈论自己的情夫,表现出强大的爱情感染力。卢梭终于把她与理想中的美丽女性朱丽合二为一了。“我听着她说话,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竟幸福得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这是我在别的女人身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在我们两人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她用她对情人所表现的全部爱情,激发起我对她的爱情来了。”

在乌德托夫人走后,卢梭意识到自己心里发生了某种变化,同时感到自己的这种感情是很不幸的。不久,乌德托夫人又一次来访,卢梭被邪念和

羞涩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她面前直发抖,既不敢开口,也不敢抬头看她,心中的慌乱无法形容。他只只好向她袒露自己的心情。乌德托夫人以极大的敬意和温存怜悯她的痴情,有时还给一点责备。卢梭于是也自责起来:“我把所有强有力的理由都找来帮助我扼杀这份爱情。我的操守呀,我的感情呀,我的原则呀,可羞可耻呀,不忠不义呀。最后还有个理由:以我这样的年纪,还让最荒唐的热情燃烧起来,而且对方已经心有所恋,既不能对我的爱有所回报,又不能让我保留任何希望,未免太惹人笑话了。而且这样荒唐的热情不但不能由坚持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苦不堪堪。”

可是乌德托夫人的心早就给了圣朗拜尔,在她83岁的人生中,她与圣朗拜尔相依相恋50年。尽管她对卢梭非常尊敬,也能理解他的火热感情,可是她对圣朗拜尔的坚贞之情,不允许她另有所依,凡是最缠绵的友情所能给予的,她都尽情给予卢梭,任何使她失节的事,她都坚决打住。那段时间,她常

常来看卢梭,卢梭也常常去看她,可谓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卢梭为什么在人届中年时,才第一次在乌德托夫人这里产生了真正的恋情呢?

卢梭在其青年时代没有获得爱情的机会和心境,他作为一个四处漂泊的人,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前途而不是爱情。在对乌德托夫人产生恋情时,卢梭已与戴丽丝同居多年,戴丽丝是个没有文化的俚女,虽然心地善良,能与卢梭相依为命,但两人之间不存在相互的理解和交流,也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而这一次,卢梭实际上还是失败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女人并没有强烈的节俭观念,而乌德托夫人决意不肯委身于卢梭,也许正因为她的内心深处并未真的与卢梭平等。

对于那些热烈的生命来说,一旦意识到自己已入暮年,都会出现青春激情的重现,这可以看成是生命的回光返照。80岁的歌德曾经痴痴癫癫地爱上了一位18岁的姑娘,卢梭这回的恋情正与歌德相同。

摘自《中山日报》

今天还有一景,你们没有注意到。你们听听周围有什么声音?学生们根据老师要求,都纷纷注意去听,他们听到了风声。接着,他提醒学生注意,这种风声与平日听到的风声不同。他说,此处多古松,风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密,风过其间,其声飒然,自然与别处风声不同,这就是松风。学生们在钱老师的启发引导下,几多思考,几多观察,几番讨论,感到其乐无穷,下笔也就言之有物了。

摘自《风雅颂》

这个故事是由读者告诉我的:

一位歌唱比赛的评委在听一位参赛者唱完一首歌后问:“谁叫你来的?”“朋友。”

评委答:“他们不是你的朋友。”

这故事叫我们惭愧。上一次我们对朋友讲老实话是几时?都掩没了良心,为着皆大欢喜,为着

应该是1988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了一遍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12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夏街四楼层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电话终于来了,我提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

牛津何以“牛”

孙晓骥

在牛津城的broad street和商业街交接处,笔者找到了“水石书店”。在一楼咖啡厅坐下,便迫不及待地点了一份espresso,翻开刚从书架上取来的新书《我们的大学为何不再教授生命的意义》,作者是耶鲁法学院的讲座教授安东尼·克隆曼。他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大学的通识教育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庸俗化?”作者自问自答,认为美式办学模式造成了当前大学文化的“悲惨景象”。

在近日推出的《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上,牛津大学连续第七次占据英国优秀大学排名榜首。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泰晤士报》创办此排名以来,剑桥大学就长期占据着第一位置,牛津只得屈居次席。但从2002年开始,牛津终超剑桥,并将纪录保持至今。

多年来,英国高校仿效美国的教育产业化,因而被指责为导致社会庸俗化的敛财机器。作为英国大学的执牛耳者,牛津大学对美国教育产业化理念的输入可谓不遗余力。更为重要

的是,牛津成功引入了美国大学的捐赠机制,学校财力剧增。牛津人甚至将他们大学的独立学院制比作美国的联邦制政体,声称这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治学原则。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在今年排名榜的各项指标上,牛津与剑桥相差无几,然而在“学校设施建设”一项上,牛津则大大领先于包括剑桥在内的大部分英国高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媒体排名上金钱决定名次的“真理”。

牛津大学去年发起了10亿英镑的筹资运动,用以兴建学校建筑和发放奖学金。在雷德克里夫新建的校园便是这场筹资运动的成果。学校近期还斥资6000万英镑建了欧洲最大的化学系,并改建了经济系大楼,紧接着又修建新的社科图书馆。

当然,经济政策上的“亲美”并未使牛津丧失对英国古老传统的恪守。虽然年收入逾6亿英镑的牛津已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大学之一,但它依旧保持着古朴风格。初到牛津的人,都会觉得每个学院都像废弃的古庙,一进门就给人一种

寂寞与萧瑟之感。有些学院上课时,甚至还规定必须穿黑袍,正式的考试、庆典,更是维系中世纪的繁文缛节。一位在林青学院念书的朋友告诉笔者,牛津最厚的一本书就是他们的考试法典,上面记录了数百年积累下的各种条款,学生们至今需要对其中的章程恪守不渝。

保留这些“过时”的规矩,看似没有必要,实际上却反映了牛津对待传统的严谨态度和学术独立性。据说,在布莱尔执政时期,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有一位女生获得牛津面试机会。但校方在面试后却认为她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潜质,婉拒了其入学申请。

当地政府甚为不平,便将此事“反映”到英国议会,甚至请布莱尔出面求情。岂料,牛津仍然拒绝接受此学生,理由只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权更改学院的面试结果。尴尬的布莱尔在事后抱怨牛津过于古板,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师生听闻后十分愤慨,立即取消了原定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的计划,并对政府干预校方事

务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议。

在重视传统及阶级意识的英国社会中,牛津大学声望之高,其影响力无远弗届。在英国历届49位首相中,毕业于牛津的就有25位。其校友中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但牛津从来不会因“政治正确”而违背传统,不论对方是谁。正是这种近乎刻板的价值观,让牛津得以从一个“养不起自己学者”的修道院,发展为英国大学的一面旗帜。

回到我所在的书店——这个“星巴克”文化与牛津传统的接合部。在全球教育日益美国化的今天,它颇能象征英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在变革中如何才能不迷失自我传统。这使笔者想起前段时间国内流行的一个说法:过分的市场化或官场化,都是制约大学发展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既远离了“官场”,又在教育产业化与古老传统间保持了良好平衡。这恰如牛津的默顿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两者组建时间虽相差了7个世纪,却能在21世纪的今天同时存在,联为整体。

摘自《新民周刊》

北大三位老校长

敢言敢怒马寅初

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时,领到《迎新手册》,首页便是校长马寅初写的《热烈欢迎新同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他,矮矮胖胖的个子,身体非常结实。他用一口“绍兴官话”向同学们讲话,他的脸像弥勒佛似的,总是笑嘻嘻的。1959年,我吃惊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连篇累牍的“批判”马寅初人云尔的文章。不久,就连大饭厅的墙上,也贴出批判大字报。也就在这时,我读到马老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反驳文章,他“明知寡不敌众”,却“单身匹马,出来应战”。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身陷重围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大的学生:“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此后,虽然马老被撤掉北大校长之职,但是他的“不屈不淫”,他的“敢言敢怒”,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1981年,我买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书。这本书是旧著汇编,收入了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闪烁着真知的光芒。马寅初在1957年就明确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然而,马寅初先生的远见卓识,却荒谬地遭到了“批判”。

马寅初先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发现了真理,而且在于于勇敢地坚持真理。在《新人口论》一书中,可以读到马寅初当年面临围攻时振聋发聩、坚持真理

的声音:“……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先生在围攻面前,不低头,不后退,即使在1960年以后,他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仍奋战不息。他依旧不断地写作,写好后无处可发表,就把稿纸粘连在一起,卷成一卷,存放在柜子里。春去秋往,他的稿箱竟堆满一柜。

坦坦荡荡陆平

马寅初的继任者是陆平。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爱听陆平校长的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口齿清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经过“文革”的人,几乎都知道陆平的大名,因为“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陆平的,当时,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那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北大大膳厅的东墙,一个中年女人领着一伙人,正在贴大字报,为首之人叫聂元梓。有人飞快地抄录了大字报全文,送到正在北京市委开会的陆平手中。陆平深为震惊,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察觉到了,并力图阻止。但身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却另有恃无恐。6月1日,陆平又去北京市委开会。散会时,接到通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为之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向全中国广播?果真,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播出了这张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之《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陆平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挨五年“批判”,谁

知道后来竟翻了一倍——十年。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陆老不愿多谈自己蒙受的灾难,他用风趣的口气说:“我天天坐‘飞机’,而且是‘喷气式’的。”

1969年,当“一号通令”下达后,陆平被逐出京城,押往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监督劳动。他单独关押,不准“乱说乱动”,几乎与世隔绝。

有一次,我问陆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是怎么过来的?”他爽朗地笑了,双眼透过紫色边框的近视镜片射出坚定的目光:“第一,我相信自己。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平生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种种不实之词,我坦然,我从来没有悲观。第二,我相信党,相信人民。我深信,有朝一日会水落石出的。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是坚定不移的,是充满信心的。有了这两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

直道而行傅鹰

在北大求学之时,我接触最多的,要算是副校长傅鹰教授。傅鹰先生执教多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完了这些科学的未知数之后,就用目光扫一下课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了。”后来,傅鹰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这些热切期望,竟被说成是“腐蚀青年”、“鼓动青年成名成家”,真是颠倒黑白。

傅鹰早年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1928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夫人张锦是他留学时的师妹,于1933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和他一起回国。1941年,傅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厦

门大学七个带长字的人中,六个是国民党党员,唯独傅鹰不是。国民党的相关人员要求他人入党,甚至让大人物陈立夫出面,找傅鹰谈话。傅鹰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已看清,因此,他感到很恼火。于是,在1944年底,他和张锦一起又飞往美国。不问世事的傅鹰夫妇专心搞起了科研,接二连三地发表高水准的论文。美国的一些教科书和科学专著,都引述了傅鹰教授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张锦则在有机分析的领域内连连出击,不断获胜。傅鹰夫妇在美国化学界的声音越来越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傅鹰,本可以在美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他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决定举家回国。当时,正值张锦怀孕,很多朋友善意地劝傅鹰晚一点回去。因为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可成为美国的公民。然而,傅鹰夫妇却恰恰为此事着急,巴不得早一点离开美国,为的是使未来的孩子不成为美国籍。

回国后,傅先生的心直口快使他在1957年差一点成为“右派”。毛泽东称傅鹰是“中间偏右”的典型,总算使他免于苦难。他的敢说真话,使他在北大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尤其是“文革”,他被斗得死去活来,依然直言不讳。在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上头”派了解傅鹰的动向。傅先生对别人说:“我担心总理死后天下大乱!”那人问:“‘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傅先生直截了当答曰:“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了张春桥,张是要闹乱子的。”

傅先生直道而行的品格,确实令人敬佩,感人至深。

摘自《名人传记》